DOI:10.14105/j.cnki.1009-9840.2026.05.011

新时代中国体育对外援助转型的系统研究

俞大伟
(台州学院 教师教育(体育)学院,浙江 台州 317099)

摘 要:在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和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中国体育对外援助亟待转型发展。本研究基于系统论视角,强调整体与部分的协同及动态特征,为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多主体协调运作和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提供理论基础。源于外部环境与局势的动态变化、内部改革与治理的日益深化、援外系统与结构的逐步优化等转型动因,从宏观调控、中观执行、微观操作三个层面构建了转型策略。在宏观调控层面,需要构建制度型法律主导系统、服务型政府引导系统和理论型政策导向系统,以完善法律框架、优化政策制定和提升国际话语权;在中观执行层面,需要推动从"举国型"向"多元型"转变,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援助效率;在微观操作层面,倡导从"全面型"向"灵活型"转变,构建软件引领型、非政府表达型和小巧多样型实践系统,以提高援助项目的针对性和可持续性。

关键词:体育对外援助;系统论;体育治理;对外援助;体育志愿服务
中图分类号:G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840(2026)05-0016-08

Systematic Stud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Foreign Sports Aid in the New Era

YU Dawei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P.E.*, *Taizhou Univ.*, *Taizhou* 317099,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and the accelerated advance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hina's foreign sports aid urgently requires transformation.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systems theory perspective, emphasizes the coordination and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whole and its parts,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multi-agent coordinated operation of China's foreign sports aid and its adaptation to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transformation drivers stem from dynamic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e deepening of internal reforms and governance, as well as the gradual optimization of the foreign aid system and structure. From the macro, meso and micro levels, the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are constructed. At the macro-regulation level,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n institutional law-led system, a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guidance system and a theoretical policy-oriented system, so as to improve the legal framework, optimize policy formulation and enhanc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At the meso-execution level, a shift from a "national-model" to a "diversified-model" is promoted to encourage the particip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social forces, optimiz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improve aid efficiency. At the micro-operation level, it is advocated to shift from a "comprehensive" model to a "flexible" model and to build a software-driven, non-governmental expressive and small-scale diverse practice system, so as to improve the targeting and sustainability of aid projects.

Key words: foreign sports aid; systems theory; sports governance; foreign aid; sports volunteer services

收稿日期:2025-08-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编号:21BTY003)。
作者简介:俞大伟(1977-),男,辽宁沈阳人,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体育外交。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系统论是一种强调整体与部分相互联系和作用的理论，为研究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了独特视角。它关注系统内各部分的协同和整体运作，强调系统的动态性、层次性等特征。中国体育对外援助作为一种涉及多方面协调与合作的实践活动，符合系统论的基本原则。从系统论视角出发，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实施过程、效果及其所处的内外部环境，进而为推进其转型提供理论支持。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中国体育事业的持续发展，中国体育对外援助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目前，关于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一些学者从历史发展脉络出发，梳理了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演变过程，指出其从最初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文化传播，到如今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的合作模式转变[1]。另有学者关注体育对外援助在提升中国国家形象、促进国际合作等方面的作用[2]。然而，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的政策分析或个案研究，缺乏从系统论视角深入探讨体育对外援助的整体性、动态性及其转型动因与策略。对体育对外援助转型过程中涉及的多主体协同、资源配置优化等问题的研究相对不足，难以为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持续发展提供全面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建议。基于以上背景与现状分析，本研究旨在探讨以下问题：中国体育对外援助在系统论视域下呈现出怎样的特征与结构？其转型推进的动因有哪些？如何从宏观调控、中观执行、微观操作三个层面构建有效的转型策略？通过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期望为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未来发展提供更系统和前瞻性的思路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通过深入剖析系统论的基本原理，构建适用于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研究的理论框架，明确其系统构成要素、层次结构和运行机制。其次，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体育对外援助案例，运用该理论框架进行剖析，揭示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存在的问题及转型需求。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与政策文件，探讨中国体育对外援助转型推进的动因，从宏观调控、中观执行、微观操作三个层面提出具体转型策略，并通过案例验证其可行性和有效性。最终，形成对中国体育对外援助转型推进的系统性认识和全面建议，为相关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1　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系统理论基础

系统论是一种强调整体与部分相互联系和作用的理论，关注系统内各部分的协同和整体运作[3]。作为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符合系统论的基本原则。首先，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实施不能仅依靠单一的部门或机构，而需各相关方面的协调合作，包括政府、体育组织、国际合作伙伴及受援国的共同参与。每个参与方都是系统中的子系统，只有在规则和秩序下共同运作，才能实现体育对外援助的总体目标。其次，系统论的动态性特征体现在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过程中。体育对外援助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长期发展中不断调整和变化。从系统论的层次性原理出发，要统筹兼顾高层次与低层次、整体与部分、系统与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而将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系统划分为三个递进层级，分别是宏观调控系统、中观执行系统、微观操作系统。

从系统论视角看，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效果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密切相关。体育对外援助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手段，必须适应受援国的具体情况，考虑文化差异、政治背景、经济水平等因素。中国在制定体育对外援助政策时，会根据不同地区特点调整援助内容和方式。在非洲，体育对外援助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竞技体育发展[4]，在拉丁美洲和亚洲，则通过体育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国家间友好关系和民间交往。体育对外援助的系统论基础不仅局限于中国国内政策制定，也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体育合作密切相关。在全球体育资源不断丰富、国际体育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中国体育对外援助在全球体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加重要。通过体育对外援助，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展现责任与担当，对外传递和平发展理念，并为全球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2　中国体育对外援助转型推进的动因

2.1　由于外部环境与局势的动态变化

国际形势变化是推动中国体育对外援助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冷战结束后，国际秩序逐渐走向多极化，全球力量和政治格局发生重要变化。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中国崛起使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外交政策逐渐转向注重合作与互利共赢，体育对外援助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5]，其形式和内容也随之发生转型。从最初单纯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文化传播，到如今的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的合作模式，中国体育对外援助逐渐转型为促进国际合作和共同发展的战略工具。此外，经济全球化也对中国体育对外援助转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国际化进程加速，中国体育对外援助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财政支持，而是更多地融入综合性合作框架中。在这一过程中，体育领域的合作逐渐成为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通过建设体育设施、举办国际赛事、培养体育人才等方式[6]，不仅提升了这些国家的体育基础设施和人才储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备，还为推动经济发展和促进文化交流提供了新路径。这种转型不仅符合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实际需求，也契合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2.2 源于内部改革与治理的日益深化

近年来，中国体育事业的改革步伐显著加快，特别是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体育治理领域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改革不仅优化了体育管理体制，还提高了政策执行的科学性和资源分配的效率，为中国体育在国际援助中的角色转型奠定了基础。体育治理的内部改革注重效率与公平并重[7]，采用市场化手段引导资源配置，同时保持政府对公益性体育项目的支持，提升了国内体育治理的整体水平，并为体育对外援助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可借鉴经验。同时，中国政府在体育领域的治理方式逐步精细化、规范化，促进了体育对外援助项目管理和实施的系统化。《“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了构建全民健身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的政策框架，不仅为国内体育事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也反映了中国在国际体育援助领域从单一援助向多元化、可持续援助转型的趋势[8]。在此过程中，中国体育管理机构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尤其在资源整合、跨部门合作和政策落实方面，为体育对外援助项目提供了更强的执行力和推广力。这个过程不仅提升了体育在国家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也能够为发展中国家体育发展提供新的模式和范式。

2.3 基于援外系统与结构的逐步优化

随着国际体育交流的深入，单一的体育设备捐赠、教练员培训和运动员培养等传统形式[9]，逐渐无法满足国际社会日益复杂的需求，尤其是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体育作为一项具有广泛社会功能的活动，已经成为促进社会整合、改善民生和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在此背景下，中国体育援助的模式发生了重要转变，逐步从单纯的技术和人才输出，转向更为广泛的综合领域援助。重点不再仅局限于提升体育竞技水平，而是更加注重通过体育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融合发展，推动社会整体进步。此外，体育对外援助系统化推进，体现在跨部门合作与资源整合方面。中国在体育对外援助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和资源共享的协作机制。与以往单一部门独立运作的援助模式不同，当前中国体育对外援助工作更加注重整合国内外的资源，形成跨部门协同合作的合力。这一变化反映了中国在援助体系中逐步优化的结构性调整[10]，依赖的不仅是体育部门，还通过外交、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融合，推动体育对外援助的综合效益最大化。在此过程中，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国外交部、商务部等机构的紧密配合，使得中国体育对外援助不仅能提升国家形象，还能在推动地区合作、促进贸易往来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3 中国体育对外援助转型推进的策略

3.1 宏观调控：从“全能型”向“智能型”转变

3.1.1 构建制度型的法律主导系统

体育对外援助的法律保障不仅为国际体育合作提供了明确的行动框架，还确保了援助过程中各方利益的合理平衡。随着中国体育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完善法律制度已成为提升体育对外援助质量与效益的重要保障。因此，建立一个以法律为核心的制度体系，不仅能优化体育对外援助的流程与操作，还能增强中国体育的国际话语权，推动其走向更加自主、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中国在体育领域已取得初步法律建设成果，如，《体育法》及相关条例的出台，但在体育对外援助的具体法律规定上，仍存在一定的空白或不足[11]。因此，需通过立法途径完善体育对外援助的法律框架，明确援助对象、方式、资金管理、项目评估等方面的法律要求，为实施提供明确依据。同时，法律法规的制定应注重与国际公约和协议的衔接，确保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符合国际标准，并有效应对国际环境变化与挑战。透明和合规的法律程序能避免援助过程中出现腐败与滥用现象。通过法律保障援助项目的公开招标、资金使用公开化和项目执行定期审查等机制，最大程度地提高援助公信力，确保资金合理使用，提升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国际形象。

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体育外交已经超越传统的国家间体育合作范畴，呈现出更加复杂与多样化的趋势。因此，法律执行力的提升不仅需要依靠政府监管，还要依托社会、企业等多方力量的协同合作。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战略背景下，国家层面的体育对外援助需与地方政府、体育机构、企业及社会组织形成更加紧密的合作网络[12]。法律执行力能确保各方在体育对外援助项目中的责任落实，防止利益冲突与滥用，保障项目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在国家层面，中国体育发展已进入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如何借助体育外交提升国家综合实力[13]，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体育对外援助不仅要在法律层面得到保障，还应与国家的外交政策、经济发展战略和文化交流等紧密结合。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体育对外援助不仅是经济援助，还应承担文化传播、民间交流等多重任务，这要求法律体系覆盖更广泛的领域，确保项目多元化功能和目标的实现。在实施体育对外援助过程中，通常需要大量专业人才提供支持与服务。因此，相关法律建设不仅要涵盖项目资金和资源管理，还要规范人才交流机制，从而提高援助项目的成功率和效益。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3.1.2　构建服务型的政府引导系统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体育对外援助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日益多样化的需求，如何通过政府引导提升援助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服务型政府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机制，不仅要在政策制定、资源配置和项目执行中发挥作用，还需注重为体育对外援助提供智力支持、能力建设和长期发展保障[14]。传统的体育对外援助模式通常侧重单一资源输送和体育设施的建设，缺乏系统的整体设计和战略思维，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援助效果的提升和援助对象的可持续发展。构建服务型政府引导系统需要从宏观层面优化政策框架，科学制定符合国际社会发展需求的援助战略，特别是在体育文化交流、体育人才培养和体育产业合作等领域，注重与各方利益协调与资源共享。该政策框架的构建不仅能提升对外援助的精准度和效率，还能够使援助活动从单一项目向更具系统性与综合性的方向发展。构建服务型政府引导系统的重要方面是有效配置国家资源，特别是资金、技术和人才资源，支持体育对外援助的各个方面[15]。政府可以通过建立专项基金、设立体育对外援助平台及推动国际合作，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与配置，不仅帮助受援国实现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还能够提升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综合效益。

服务型政府不仅要提供资源和政策支持，还需要对援助项目的实施效果进行持续跟踪评估，确保援助项目真正产生预期效果。政府可以通过建立科学评估体系，定期评估体育对外援助项目效果，确保项目目标与执行内容契合。在评估过程中，政府应关注援助项目的长期影响，尤其是对受援国体育人才、体育文化和体育产业等方面的深远影响，避免因完成短期目标而忽视援助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构建服务型政府引导系统的关键在于建立高效协同机制，增强政府部门及非政府组织间的合作。中国体育对外援助涉及多个领域与部门[16]，如外交部、文化和旅游部、体育总局等。如何实现这些部门的有效协同和资源共享，是政府引导系统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政府可以通过建立跨部门协作平台，推动政策信息共享与交流，减少部门间的重复和低效工作。同时，政府应建立与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及外国政府之间的合作机制，促进全球范围内体育对外援助资源整合与共享[17]。通过这样的协同机制，可以有效提升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整体效果与国际声誉，为转型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和操作支持，推动中国体育从单一资源提供者向智能型、多元化、可持续的国际体育合作伙伴转型。

3.1.3　构建理论型的政策导向系统

理论型政策导向系统应从“全能型”援助模式改革入手，明确其转型的必要性。在以往的体育对外援助实践中，中国的援助模式多依赖单一的物资投送，忽视了与文化、技术和人力资源的深度合作。在全球化背景下，体育对外援助的效果不仅取决于资金与物资投入，更依赖于可持续发展能力，特别是如何通过政策引导实现体育文化输出与合作。理论型政策导向系统应明确援助核心目标，不仅要促进援助国体育发展，还要在这过程中实现文化交流与国家形象塑造。对于政策层面的转型，中国体育对外援助不应侧重于硬件赠送[18]，更应通过教育、培训、技术转移等手段推动受援国体育体系自主发展。同时，构建理论型政策导向系统需要整体性和多维度的考虑。这包括政府、学术界和国际组织等多方力量的协同合作。政策制定者应在全面理论框架指导下，明确体育对外援助的长期战略方向，并在具体操作中做到灵活调整和及时反馈。该理论框架不仅体现了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政策方向和内在规律，还包括对国际体育合作潜在风险的预见性分析。对于中国而言，体育外交不仅是为了经济利益，更是为了展示国家文化与塑造软实力。因此，理论型政策导向系统应包括文化传播、政治合作和经济利益的平衡，并据此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

中国在设计体育对外援助计划时，应根据援助国的实际情况量身定制符合其发展需求的援助方案。对体育基础较弱的国家，应优先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教练员培训和运动员选拔体系的建设。对体育水平较高的国家，应加强技术交流和赛事组织的合作。这种根据需求分类别、分层次的援助方式[19]，能更好提升援助效果，助力加强中国与受援国的长期合作关系。此时，政策导向系统应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和评估体系，对援助项目效果进行及时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动态调整。只有通过科学评估体系和透明执行流程，才能确保政策实施效果，避免资源浪费或援助效果的削弱。构建理论型政策导向系统还应考虑中长期发展规划。体育对外援助的转型不仅回应当前需求，更是对未来体育全球化格局的前瞻性布局。随着全球体育产业快速发展和科技不断进步，体育领域援助模式将更加多样化和高端化。此时，中国体育对外援助政策应具备前瞻性，通过理论型政策导向系统的引导，逐步向“智能型”援助模式转变。智能型援助不仅依赖传统物资和资金支持，还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提升体育对外援助的精准度与效率，为全球体育发展提供更智能化、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3.2　中观执行：从“举国型”向“多元型”转变

3.2.1　构建竞争型的企业参与系统

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参与体育对外援助体系的建设，这既是对外援助战略转型的需求，也是中国体育产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业国际化发展的内在动力。构建竞争型企业参与系统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作用，确保企业在体育对外援助中的主动性和自主性。过去，中国体育对外援助模式主要由政府主导，尤其在“举国体制”发展模式下[20]，体育对外援助通常由国家机构统一组织和实施。激发企业活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参与机制，有助于更好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动体育对外援助朝着灵活、多元化方向发展。应鼓励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特色，主动承接体育对外援助项目，提供设施建设、运动员培训、赛事承办等多方面支持[21]。在构建竞争型的企业参与系统时，政府需设计公平、透明的市场准入机制和激励措施，确保各类企业平等竞争，并根据资源、技术和经验的差异发挥各自优势。企业可在政府引导下依托本土优势，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符合需求的体育援外服务，同时注重产品创新和服务质量，以增强其国际市场竞争力。此外，构建竞争型系统要求政府为企业提供充足的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如税收优惠、融资支持等，帮助企业克服国际市场的各种挑战。这些举措可以有效促使企业在体育援外领域形成良性竞争，提升体育对外援助的质量与影响力。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技术、资本、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这些优势可以有效地转化为提供对外援助的独特资源。一些大型企业可以通过赞助体育项目或建设体育基础设施，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体育产业水平。一些科技型企业可通过提供体育科技支持、培训现代化体育管理人才等方式，提升受援国可持续发展能力。企业还可通过跨国公司与本地合作伙伴联动，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体育文化，形成以体育为载体的多方共赢模式。多元化的企业参与方式能够推动体育援外体系现代化，使其更贴近市场需求，同时为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上提升品牌影响力提供广阔空间[22]。随着国际体育市场的发展，企业的竞争力不仅体现在经济实力上，还需在文化认同、品牌建设等方面体现独特优势。中国企业在国际发展援助中的角色，不仅要体现“硬实力”的支持，还应注重“软实力”的提升[23]。企业通过创新品牌建设和提升国际知名度，可以在全球体育行业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体育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还能增强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竞争中的综合竞争力。在未来实践中，政府需要通过政策支持和市场引导，帮助企业提升全球竞争力，同时推动中国体育事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贡献。

3.2.2 构建激励型的社会参与系统

激励型社会参与系统应注重建立合理的利益驱动机制。这一机制的核心是通过激励社会各方，促进其在体育对外援助项目中发挥更大作用。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手段，激励企业和民间组织积极参与体育援外项目的实施和推动[24]。例如，政府可以为企业提供税收优惠，鼓励其为体育外交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只有确保参与者及时获取相关信息，了解项目实施情况和进展，才能有效增强他们的参与感和归属感。体育外交的成功通常依赖于良好的信息共享机制。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应定期发布项目进展报告，组织座谈会和研讨会，建立信息畅通的网络平台，促进各方在项目推进中的互动与沟通。通过信息透明和交流，能够减少参与者疑虑，提高参与意愿。体育援外项目不仅是资源和资金的投入，更是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增进国际理解和友谊的重要途径。因此，在推动社会驱动过程中，应引导参与者认识到其承担的社会责任[25]。企业除了享受政策优惠和市场利益外，还应通过支持体育援外项目，树立社会责任形象，提升社会影响力。在民间组织和个人参与中，应鼓励其发挥社会责任感，推动跨国界的文化与体育交流。

社会组织相关从业人员的能力和专业素质，直接影响体育援外项目的效果与质量。因此，政府应当加大对社会组织和参与者的培训力度，通过举办培训班、讲座和交流活动，提高社会参与者的专业素养和执行能力。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建立专家库和咨询机制，为社会参与者提供政策支持和技术指导，确保体育援外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能顺利推进。对于参与体育对外援助的各方，应建立完善的成果评估机制，通过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及时评估和反馈各方的贡献[26]。这不仅有助于激励参与者的积极性，还能够为今后的体育援外项目提供经验借鉴和改进方向。政府可以通过表彰和奖励优秀参与者，提升其社会声誉，从而激发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投入。随着体育对外援助项目推进，社会参与的形式和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需要建立灵活的制度和机制，适应不同阶段的需求。在援助初期，政府可通过提供直接财政补贴等方式激励参与者。而在项目逐步成熟和发展后，可以通过市场化运作和创新型合作模式，拓展和扩大社会参与的广度与深度。通过不断优化激励机制和参与方式，确保社会参与的长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为体育对外援助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3.2.3 构建广泛型的民间融合系统

民间力量可以通过体育行业的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参与，这些组织通常具有灵活的运作机制和广泛的社会联系，能够在特定地区或项目中快速响应，从而推动体育对外援助的精准实施。通过与政府部门合作，这些民间组织在体育对外援助中能发挥桥梁作用，帮助实现体育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互通。已有国际体育志愿服务通过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将中国体育资源带入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社区体育建设、教练员培训等项目，促进了体育文化传播和体育合作的深化[27]。近年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来，中国政府逐步加强了对民间力量参与体育外交的支持，通过法律法规的引导和奖励机制，为民间力量的广泛参与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政府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民间组织开展国际体育合作，并提供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参与体育援外项目。这些政策的出台极大激发了民间力量参与体育对外援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推动了体育对外援助的多元化发展。构建广泛的民间参与系统不仅是提升援助效能的必要条件，也是促进体育外交转型的战略举措[28]。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深的今天，体育作为和平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已不再局限于政府间的交往，更需广泛吸纳民间力量参与，以形成多元、灵活和可持续的体育对外援助格局。

民间融合系统的建设需要注重广泛动员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普通民众的参与。普通民众作为体育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其参与不仅局限于直接捐赠或资金支持，还应通过更广泛的渠道理解并支持体育外交政策。通过公众教育和意识提升，社会大众可以更加自觉地参与体育对外援助项目，通过志愿服务、赛事观众和文化交流等形式[29]，推动体育对外援助项目的顺利实施。例如，通过组织国际体育赛事志愿者或鼓励民众参与国际运动员培训计划，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体育对外援助项目的意义，进一步夯实民间参与的社会基础。在构建广泛民间参与系统的过程中，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同样至关重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民众之间的信息流动与资源共享，能提升体育对外援助项目的透明度和效率，避免资源浪费和项目重复实施。在此过程中，政府可通过建立公共平台，发布体育对外援助相关政策信息和实施进展，企业和社会组织可在平台上分享成功案例和经验，民众可通过网络平台参与项目讨论和监督[30]。这种信息共享机制不仅提高了各方的协同效应，还增强了社会各界对体育对外援助的信任与支持。民间力量的融合不仅提高了体育援外项目的实施效果，还拓宽了体育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3.3　微观操作：从“全面型”向“灵活型”转变

3.3.1　构建软件引领型的实施系统

随着全球体育交流与合作的日益深化，传统的“全面型”援助模式逐渐暴露出在个性化需求、项目灵活性、适应性和可持续性方面的不足。在此背景下，推动中国体育对外援助向“灵活型”转型，构建高效、灵活且具有引领作用的实施系统尤为重要。在这一过程中，软件技术中的信息管理系统和智能工具，作为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软件引领型的实施系统能有效弥补传统体育援外模式在资源配置和援助效果评估等方面的局限[31]。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工具能够精准收集和分析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体育需求数据。通过建立全球体育需求数据库后，可以对受援国的体育基础设施、人才培养、群众参与等现状进行系统分析，为援助策略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数据驱动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提高援助资源的使用效率，避免资源的浪费和重复建设，提升援助项目的效果和可持续性。通过使用现代信息管理系统，援助项目的任务、进展和成果可实时跟踪反馈，相关各方能随时了解项目的实际进展。基于云计算技术的管理平台可让各国体育外交部门、援助机构、实施单位等实时共享项目数据并协同开展工作。这种信息透明化机制不仅提高了项目管理的效率，还增强了执行的公信力。

在实际操作中，国家和地区间体育发展水平、文化背景和政策需求等差异显著，单一援助模式难以满足多样化需求。智能化系统根据受援国具体情况，可量身定制体育对外援助方案。系统可根据数据分析推荐适合的体育项目类型，如青少年体育培训、竞技体育提升、体育文化交流等[32]，并根据各国需求调整项目内容和实施方式。智能系统支持动态调整和优化援助方案，使体育援助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构建软件引领型的实施系统有助于提升跨国体育合作的协同效应。在国际体育合作中，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政治体制差异以及体育发展重点差异，常常制约合作的顺畅性。通过信息化手段，相关国家和机构可在同一平台上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实现多元体育合作的无缝对接。例如，在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体育合作中，可通过数字平台实现人才交流、赛事合作等内容的实时对接，减少传统模式下沟通不畅、信息滞后等导致的协作问题。此外，软件引领的实施系统能提升体育援外项目的可持续性。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构建长期运营的智能平台可持续跟踪评估项目效果和影响，确保体育对外援助从短期投入转向长期收益，保障项目在长期运行中的可持续性。

3.3.2　构建非政府表达型的推进系统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体育已经不再仅是国家层面的事务，而是通过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渠道，形成了更加多元的交流与合作机制。这些组织，特别是在公益事业、体育产业发展和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不仅为国家体育对外援助提供资源支持，还能在实践中弥补政府援助系统的不足。中国体育公司和相关非政府机构通过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33]，逐步形成了一条涵盖文化交流、人才培养、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援助链条，这一模式能够灵活应对受援国的不同需求，并为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转型提供新的思路和实践基础。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并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参与形式和合作内容。这不仅拓宽了体育对外援助渠道，还能通过更高效的资源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配置，使体育对外援助的实施更符合国际规则和受援国的实际需求。社会责任逐渐成为体育援外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中国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时，也通过资助国际赛事、支持体育人才培养等方式，将体育对外援助与企业发展战略相结合，从而促进中国体育外交的深度融入。这种非政府表达型的合作体系，是中国体育对外援助从“全面型”向“灵活型”转变的关键组成部分，具有高度的可操作性和适应性。通过构建非政府表达型的推进系统，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转型不仅顺应全球化趋势，还能够有效应对国际局势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挑战。

推动非政府表达型推进系统的构建，需要加强政策引导与制度保障。一方面，政府应为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提供更宽松的政策环境，简化相关行政审批程序，推动跨部门、跨领域的合作。另一方面，应通过建立专门的评估机制，及时监督与反馈非政府渠道的体育援外活动，以确保援助效果的持续性和高效性。此外，还应强化公共资源的配置与共享平台建设，使政府与非政府行为能在实践中更好地协同合作，提升援助工作的效率和精准性。非政府表达型推进系统的构建还需注重区域性与专项性的灵活调整。中国在实施体育对外援助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需求差异较为明显。例如，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可能是最迫切的需求[34]，而在其他一些国家，体育产业发展和人才培训则是重点需求。因此，构建非政府表达型推进系统时，应根据受援国的具体需求和现有条件量体裁衣，制定个性化的体育对外援助策略，避免“一刀切”的做法。这一思路不仅能有效提高援助的效率与影响力，还能促进中国体育与世界各国的深度合作，为全球体育文化的多元发展做出积极贡献。通过非政府渠道在国际体育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不仅能够促进体育技术、设施、人才的交流，还能深化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认同。这种文化交流的模式在提升中国体育影响力的同时，也促进了受援国的体育文化发展，从而实现体育对外援助的多重效益。

3.3.3 构建小巧多样型的实践系统

“全面型”援助模式侧重大规模、标准化的体育项目援助，尽管这种方式在初期实现了中国体育外交的广泛覆盖，但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体育合作需求的多样化，过于统一的援助模式逐渐显露出弊端。相较而言，小巧多样化实践系统更能适应当前体育外交的新需求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35]，具备更高的灵活性和针对性。该系统强调根据受援国的具体需求，量体裁衣地设计援助项目，从而提升中国体育援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在实际操作中，应根据受援国的社会、文化、经济背景以及体育发展现状与优先发展领域，定制化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对外援助。例如，某些国家可能需要设施建设援助，而另一些国家则更需要体育教育和教练员培训。因此，中国应通过细致调研与分析，提前了解各受援国的具体需求，并在援助方案设计时注重灵活多变。小巧多样型实践系统不仅仅是单一的体育项目，而是涵盖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体育文化交流、体育人才培训等多个方面，既考虑不同受援国的体育基础差异，也考虑不同体育项目的特色需求。构建多元化的专业团队是推动体育援外模式灵活转型的重要一环。中国体育援外人员不仅需要具备传统外交技能，还应具备体育管理、体育项目策划与执行、跨文化沟通等多领域的复合型能力。这类人员的多元化能够确保体育援外项目顺利操作，并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调整策略和计划，避免因模式单一而导致的实践困境。

在资金和资源配置方面，小巧多样化实践系统要求更加精细化的管理模式。以往“全面型”援助系统通常依赖于集中式资金与资源配置方式，这往往导致资源低效使用。小巧多样型实践系统通过项目化、精细化管理模式，确保每个援助项目得到充分资源支持，并能及时跟踪执行效果。这一模式不仅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率，还为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积累了宝贵经验和数据，使未来援助项目更加科学和数据化，更好地适应国际社会需求。“全面型”模式通常关注短期体育项目成效，却忽视了项目后期的可持续性问题。灵活型系统则注重项目长期影响与后期效益，通过与当地社区和体育组织的深度合作，推动体育对外援助项目的长期发展。在体育设施建设的同时，中国可以与当地政府或体育组织建立长期的技术支持和管理合作，确保设施持续投入使用，并不断提升当地居民的体育参与意识和能力。这种合作模式有助于增强体育对外援助的生命力，避免援助项目“用后即弃”的问题。此外，小巧多样性系统强调建立动态评估机制，通过定期收集各类数据，包括受援国反馈、项目实践过程中的问题、受援人员参与情况等，形成多维度评估体系。该机制能够使援助项目在实践过程中实时调整策略，不断优化和完善项目设计，提升体育对外援助的精确度与针对性。

4 结 语

本研究从系统理论视角出发，深入探讨了中国体育对外援助转型的问题。通过剖析系统理论基础，明确了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多主体协同模式及其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首先，将系统理论引入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研究领域，突破了传统研究单一视角的局限，为理解体育对外援助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该框架不仅涵盖了援助实施主体和运作机制，还充分考虑了外部环境因素对援助效果的影响，使对体育对外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援助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入。其次，提出的宏观调控、中观执行、微观操作三个层面的转型策略，为体育对外援助的系统性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方法。这些策略充分考虑了不同层面的特点和需求，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有助于推动体育对外援助理论发展。在宏观调控层面，建议构建制度型法律主导系统、服务型政府引导系统和理论型政策导向系统。这将有助于完善体育对外援助的法律框架，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和连贯性，增强中国在国际体育事务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在中观执行层面，推动从“举国型”向“多元型”转变，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这不仅能够优化资源配置并提高援助效率，还能促进体育产业国际化发展，为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新机遇。在微观操作层面，倡导从“全面型”向“灵活型”转变，构建软件引领型、非政府表达型和小巧多样型的实践系统。这将使体育对外援助更贴近受援国的实际需求，提高援助项目的针对性和可持续性，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外交战略与全球体育事业发展。

参考文献：

[1] 曹俊金.新时代中国体育对外援助：政策规划与实现机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3，49(6)：47-55.

[2] 王菘，杨苓，何明，等.中华体育精神话语表达的立场、表征及体系构建[J].体育科学，2024，44(9)：21-32.

[3] 祝奉明，王子彧.系统观念视阈下共同富裕的逻辑进路[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9(6)：41-51，123.

[4] 陈元欣，刘恒.我国对外体育场馆建设的发展历程与时代价值[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5(2)：54-62.

[5] 吕万刚，陈磊，康益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指引[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4，47(10)：36-46.

[6] 张亮亮.体育精神在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中的独特作用、现实困境与实施路径[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2(5)：147-154.

[7] 纪成龙，易剑东，郑志强，等.全球体育治理的新趋势与中国体育治理改革创新[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4，39(3)：267-272，294.

[8] 王健，卓贞梅，何毅，等.新时代体育教师的健康教育使命、践行困境及纾困之策[J].上海体育大学学报，2025，49(1)：28-36.

[9] 姜咏，俞大伟.多元外交视域下我国体育对外援助推进策略探究[J].体育文化导刊，2022(3)：1-7.

[10] 郭秋梅，卢勇.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发展体系转型[J].国际论坛，2025，27(1)：58-75，158.

[11] 储贝贝，曹田夫，梁伟.新《体育法》背景下体育协会的治理逻辑与治理路径——以互益法人理论为中心[J].体育与科学，2024，45(1)：42-49，95.

[12] 田川颐，张晓义.《对外关系法》背景下我国体育对外援助的规制完善[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4，43(3)：129-136.

[13] 钟秉枢，李楠，王永康，等.习近平体育素养观的形成机理、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4，47(10)：77-88.

[14] 俞大伟，王禹苹.中国特色体育对外援助的传承与弘扬[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0，39(5)：132-137.

[15] 俞大伟.中国开启体育对外援助的动因及启示[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9，43(2)：49-54，62.

[16] 刘青，袁金宝，陈林会，等.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国体育文化建设的价值意涵、基本逻辑与实践方略[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3，40(6)：650-656.

[17] 柳鸣毅，龚海培，孔年欣，等.中国参与全球体育治理的演进特征与应对策略[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22，42(5)：1-10.

[18] 邱继旺，梁朱贵.中国体育包容性发展的国际实践[J].体育学刊，2022，2(6)：44-49.

[19] 陆海林，刘建.全球发展倡议视角下中国体育对外援助影响力提升的机遇、挑战与策略研究[J].体育学研究，2023，37(3)：108-116.

[20] 彭国强.新型举国体制赋能中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诉求与实现方略[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4，36(2)：145-153，189.

[21] 刘海元，展恩燕.对贯彻落实《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的思考[J].体育学刊，2020，27(6)：1-11.

[22] 杨世成，陈颇，刘从众.“双循环”新格局下中国体育用品贸易高质量发展：内涵、挑战与突破路径[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24，44(3)：56-66.

[23] 万晓红，周榕.中国体育国际形象调查报告(2016)[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6，50(11)：5-11.

[24] 刘震，刘桂海.中外体育人文交流探析[J].体育文化导刊，2022(8)：35-42.

[25] 汪焱，王凯珍，汪流，等.社会责任对体育社团组织绩效的影响研究[J].体育与科学，2023，44(6)：90-100.

[26] 于思远，顾帅，刘桂海.新发展阶段我国体育外交战略创新升级：环境变化、决策调整与推进策略[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2，56(3)：5-14.

[27] 黄莉.建设体育强国进程中的体育文化高质量发展研究[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4，36(2)：125-133，144.

[28] 杨桦，仇军，陈琦，等.新时代我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基于国家“十四五”体育学发展规划调研分析[J].体育科学，2020，40(8)：3-26.

[29] 宋宗佩，白亮，王菁.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提升国家形象策略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8(12)：6-10.

[30] 孙冉.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流动的逻辑构造与优化进路[J].地方立法研究，2024，9(5)：87-104.

[31] 李晓，张李云鹏，庄宇航.中国对非援助的减贫效应：基于时空估计策略的研究[J].世界经济，2023，46(7)：56-87.

[32] 王家宏，郑国荣.中国式体育现代化与体育强国建设[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2，56(12)：10-16，28.

[33] 秦立凯.中国体育产业海外并购的特征、动因及影响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7，34(4)：404-411.

[34] 于思远，顾帅，刘桂海.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体育治理的中国方案——基于文化国际主义的视角[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1，38(1)：39-46.

[35] 米军，夏周培.对外援助与文化产品出口：影响效应与机制分析[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170-190，218.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